

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初探

——以孔繁霁任教清华大学10年为叙述重心

张 洁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史学是中国传统的学问,但在旧式的史学教育中并无有关外国历史知识的教育。随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兴起,外国历史教育才随之而起。孔繁霁先生于1927—1937年任教清华大学长达10年,对中国早期世界史教育课程体系的建立颇具开拓之功。以孔繁霁先生为代表的具有新观念的史学研究者将欧美的史学观念引入中国,介绍了欧美史家多样的治史方法,设置了欧美国家史学的通识课程,在教学与研究实践中充分展现了中外史学不同思想观念所产生的现实效用的不同。这些课程的设置,不仅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积累了学习外国历史的经验,而且设计出了较完善的课程体系,使中国的史界普遍接受了新型的“史观”,为外国历史最终发展成为当下的一级学科——“世界历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孔繁霁;世界史学科;史学课程;史学观念;史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4-0024-08

前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风气由相对保守开始趋向纳新,体现在史学领域,“改造传统史学、构建新史学”就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报》连载《新史学》一文,大胆喊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决意要为“史界开辟一新天地”^[1]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开始在主要的高等院校创建了有别于传统史学体系的“史学系”(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复旦大学等),揭开了现代历史学教育的序幕,无数留学海外的学子们纷纷回国走进“史学系”,从事现代历史学教育中的外国历史部分的教学或研究,孔繁霁即是其一。

孔繁霁(1894—1959),字云卿,山东滕州人。1894年出生于天津,属孔子第74代孙。1912年

考入南开中学,与同班同学冯文潜(冯柳漪)、黄钰生等为知交,共同创办了“三育”(德、智、体)杂志《竞进会》(后改为《敬业乐群会》)。在组织学生团体活动时,与低两级的周恩来相识并成为挚友。1917年他于南开中学毕业后,自费留学美国格林奈尔学院和芝加哥大学。1923年获学士学位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师从德国“客观主义史学”大师兰克的“传人”和“光大者”迈尼克,获硕士学位。1926年孔繁霁获得柏林大学硕士学位后,在陈寅恪、傅斯年等人推荐下受聘清华大学史学系,成为当时清华大学史学系屈指可数的几个教授。目前,关于孔繁霁的研究,除其子女和部分学生(黎东方、齐世荣等)及相关学者(李孝迁、李勇、罗志田等)在有关的回忆和相关的论文中提及^①外,未有其他学者对孔繁霁从事外国历史教育的情况进行过专门研究。为此,本文拟抛砖引玉,以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10年(1927—1937)^②为

收稿日期:2022-03-04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项目“留美学人与现代历史学教育构建研究”(22HQZZ3SYB)

作者简介:张洁(1964—),男,浙江武义人,历史学博士,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①子女回忆有长女孔祥兰写的《孔繁霁历略》,宏观地勾勒了孔繁霁的一生,内容比较简单。孔祥琮执笔的《孔繁霁小传》,对孔繁霁一生的叙述比较详细。《我的一家与清华》(第一部分“我的父亲孔繁霁”)则重点介绍了孔繁霁的语言能力和学生培养情况。有关的研究论文有李孝迁的《〈史学原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罗志田的《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近代史研究》2009年3期)、李勇的《张贵永与西方史学研究》(《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等。

^②孔繁霁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长实有两段,即1927—1937年的10年与1946—1952年的7年,另在北京大学还有1953—1959年的7年,在两校史学系任教总共24年。之所以选取前10年为考察时段,是因为这10年正是清华大学史学系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10年,也是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的奠基时期。

考察时段,探析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外国历史教育概况。

一、引入欧美史家的史学观念

生活在特定社会的人们,不仅会遇到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而且会面临诸多的现实考验。为此,要求人们对过往的历史事件有所认识,对过往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使人们对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动力形成总体看法,从而产生“史学观念”(简称“史观”)。胡适认为“史观”就是“解释历史”的观念,是个人对历史的见解。那么,以什么样的“史观”指导教学和引导学生,这是现代历史学教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鉴于传统“史观”(“天命观”“循环观”“复古观”等)的陈旧落后,20 世纪以来人们对传统史学失去了信心,希望借助欧美的“史观”重建现代的“史观”。朱希祖说:“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2]3} 在这样的情形下,归国留学生们通过各种路径引进和传播新的“历史观”,开始从理论层面构建中国历史学科“新的历史意识”^{[3]63}。

为此,20 世纪初我国高等院校的外国历史课程中多列有“西洋史学史”“史学理论”“史学原理”“史学原著选读”等课程,如北京大学史学系最初由黄节、陶履公讲“史学原理”,后由胡适、何炳松接替。陈翰笙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了“西方史学史”,孔繁霁在清华大学史学系开设了“西洋史学史”“西洋史家名著选读”等。何炳松以美国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孙(J. H. Robinson)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为教材,直接以英文原本对英语程度较高的三年级学生授课,结果“发现比用旧教材效果好得多”^{[4]21}。朱希祖说:“何先生用美国鲁滨孙(Robinson)所著的《新史学》原本做课本,颇受学生欢迎。”^{[2]1} 何炳松也说:“我在北京大学同北京高师里面,曾用这本书做讲授西洋史学原理的教本,同学中习史之人,统以这本书为‘得未曾有’。”^{[2]15}

1927 年雷海宗回国后着手研究中国历史,他“以文化形态史观试图构建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框架,引起多数学生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5]68}。1931 年他在武汉大学史学系讲授“欧洲通史”,介

绍德国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 Spengler)的“文化形态学”(Morphology of Culture)。在他留下的授课提纲中——第 48 章“社会科学与社会理想”有一节“二十世纪之新历史哲学潮流”,专门讨论了《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的“哲学思想”^{[6]341}。第 51 章“西洋文化之新局面与新趋势”有一节“相对主义之新思潮”,专门介绍了斯宾格勒的“比较历史”^{[6]388}。

孔繁霁开设的“西洋史学史”(1929—1930 年在北京大学,1930 年、1935 年在清华大学,全年 4 学分)重点讲述了“西洋史学之起源及历代各派史学发展概况,尤注意各时代思想文化背景,而以近代史学观点评论重要著作之价值”^{[1]50}。他还开设了“西洋史家名家选读”(1930 年与蒋廷黻、刘崇缙合开,全年 4—6 学分),旨在使学生体会名著中之“史观”,希望学生养成“看完大部著作之习惯”^{[7]50}。1932 年雷海宗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后,孔繁霁又与雷海宗、刘崇缙、张荫麟等合开“西方史学名著选读”(1936—1937 年,全年 4—6 学分),并列有专书五种:Gibbon·E—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Dill·S—Roman Society in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Western Empire(蒂尔《西罗马帝国末世的罗马社会》);Spengler·O—The Decline of the West(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Fay·S·B—Origin of the World War(费伊《世界战争的起源》);Langer·W·T—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拉格《帝国主义外交》)^{[8]335}。该课程意在“训练精读西文史籍”,选读资料分二种:“(一)论文,由担任此课之教授,选史学论文若干篇,轮流上班指导研读;(二)专书,诸教授各担任名著一二种,学生各选定一种,个别请教授指导研读。”^{[8]334} 雷海宗“专门讲授德国史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孔繁霁专门讲授英国史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5]65}。

二、讲授欧美史家的治史方法

中国的传统史学较西方古典史学是另成一个体系,并自有其独特的治史经验,史学与他学相比也算美备,胡适甚至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9]105}。但传统史家治史的方法总

是把精力用于旧纸故堆,从书本到书本(从这本书到那本书),从文字到文字(从象形、籀文到金文、小篆),不停地在“训古、考据、辨伪”中打圈。这种方法总显得单纯与机械,未能像欧美史家那样运用“内部考证和外部考证方法”^{[10]122}。为此,史界同仁十分重视“研究方法”,期盼以科学的方法阐明史事之真相。

1922年梁启超将其在南开大学主讲的“中国文化史稿”整理成书,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名出版,批判性地吸收中国传统的治史经验,阐述其“研究方法”,成为“研究方法”的代表作。同年3月,孔繁霖收到梁氏赠送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后,用两个下午的时间读完,在《改造》^①杂志发表读后感,肯定《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中国新史之制作”^[11],并对第三章“史之改造”中提出的“‘以史为目的而不以其为手段’之语及‘真史当如电影片’之喻”^[11]之语大加赞赏。但他对梁氏“第一章史之改造及其范围”中对“史”的定义所提到的“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12]5}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良史不过于片段中找关系,‘因果’出史家范围矣。关系是活的,有一条算一条,因果是死的,要数量相等”;“言关系是史家所有事,言因果则举世无人能负责”^[11]。他在“我见”部分对梁启超关于“史笔史识史德、史家的权利义务、理想的我国史学运动”的说辞也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我国的史学运动“一宜提倡治史的兴趣;一宜厘订地上的史料;一宜采掘地下的史料;一宜分任专门的研究”^[11]。他的这篇读后感,系统地评价了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凸显了其学术视野和史学功底。

同时,各高等院校史学系也普遍开设了“研究方法”课程,如姚永朴、曹馥珊、何炳松等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了“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史学系开设了“历史研究法”,洪业在燕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了“历史方法”,孔繁霖在清华大学史学系开设了“史学方法”(1930年、1937年)。孔繁霖的“史学方法”(全年4学分)主要介绍了“德国史家伯伦汉姆的《史学方法论》和朗格诺瓦与瑟博诺司合著的《史学原论》,凡重要之辅助学科、目录学及治史必具之常识,均择要讲授”^{[13]321}。这里所讲的伯伦汉姆(E. Bernheim)乃

是德国“兰克学派”的再传弟子,著有《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朗格诺瓦(C. V. Langlois)和瑟博诺司(C. H. Seignobos)又是法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合著有《历史研究导论》(Introductory aux Etudes Historiques),他们都是德、法史学方法论的大师。孔繁霖十分推崇和赞赏这三位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并在课堂上不遗余力地进行讲解和宣传。他希望当时中国的史学家们走出传统治史的“训诂、考据、辨伪”怪圈,重视“地上的史料”和“地下的史料”,充分运用“外表的考证和内在的考证”^{[14]231},以推动现代历史学的发展。其学生黎东方说:“孔先生知道我们读过法国人塞诺波与朗格诺瓦的《历史研究入门》(Seignobos et Longlois, 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便不再强调‘克制主观成见与好恶’的重要,而着重于介绍德国人班汉姆的《历史科学读本》(E. Bernheim, Lehrbuch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这本书。”^{[15]110}

三、增加欧美国家史学的通识课程

为了扩大人们的视野,帮助学生更多地了解外国的历史文化,当时各高等院校史学系都十分重视外国历史课程群的建设。如北京大学“中国历史”向“外国历史”倾斜,燕京大学不削弱“外国历史”,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增加“外国历史”,辅仁大学积极倡导“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并重,清华大学明确“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并重。1929年蒋廷黻继任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后,在教学目标上更强调“中外并重”。1931年他在《历史学系的概况》中说:“清华的史学系向来是合中外历史为一系的,并且是中外历史兼重的。就近两年论,历史系每年平均约开出的二十一二种课程,其中中外历史各占一半。”^[16]他还特别强调学习外国历史的重要性:“第一是外国史本身有研究的必要。中国现已深入国际生活中了,闭关自守

^①《改造》1919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解放与改造》。1920年9月第3期起更名为《改造》,到1922年9月前后,共出版4卷46期,后因经济等原因停刊。《改造》前两期由张东荪、俞松华主编,后两期由梁启超、蒋百里主编。《改造》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期刊《新青年》《新思潮》杂志因主持人参加“五四运动”暂停发行,而《每周评论》又被北洋政府查封(1919年8月)后创办的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宗旨是“解放精神物质两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状态,同时介绍世界新潮,以为改造地步”。

的时期早已过了;第二是外国史学,尤其是西洋史学,有很多地方可资借鉴的。西洋史学的进步就是西洋各种学术进步的一方面。”^[16]

孔繁霁获柏林大学硕士学位以后,又曾赴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等国游学。他在美国和德国留学期间,对“欧洲古代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因而专攻“欧洲中古史”。但他不局限于“欧洲中古史”,还对整个“欧洲史有渊博的知识”^[17]¹⁴⁷。他在清华大学史学系任教的10年时间里,除开设过前述的“西洋史学史”“史学方法”和“西洋史家名著选”外,还开设了多门外国历史通识课,如“西洋中古史”(1929年、1935年、1937年)、“西洋通史”(1929年、1930年、1932年)、“欧洲近代史初期”(1930年、1932年、1935年、1937年)、“世界通史”(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0—1931年^[18]⁷⁸)、“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史”(1932年、1935年、1937年)。他所开设的课程数目之多,超过了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陈受颐开设的“西洋中古史”“近代中欧文化接触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西洋十七、十八世纪史”和“西洋史籍举要”五门课程。

在孔繁霁开设的课程中,“西洋通史”(全学年8学分)主要讲述“西洋史自史前至最近之发展,注重构成西洋文物、政教之主要成分,以期学生能得一整个纵面的历史观念(附注:历史系学生须加读参考书,授课时间每周亦增1小时,全年改为10学分)”^[7]⁴⁸。“西洋中古史”或称“欧洲中古史”(全学年6学分),主要讲授“约自西历三百年至一千三百年之欧洲史,其讲述旨趣系欲学者对于近代欧洲文化有较深之认识”^[8]⁴⁸。“欧洲近代史初期”(全学年4学分)注意两方面:“一系欧洲中古史之究竟;一系近代史之由来。讲述十四五世纪时,欧洲政治、文化由中古时代性个别的逐渐的转变近代性、过渡状况之大要。”^[8]³⁴⁷“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史”(全学年4学分),主要讲述“欧洲近代史之次期,题为宗教改革,并非狭义的宗教史之谓。因本期欧洲史乃‘再生’运动中之新倾向。宗教的变迁而外,何以由教会之崩裂,递入17、18世纪之欧洲史,及本学程注意阐明者。入门参考书:Smith. The Age of the Reformation. Beard, The Reformation in its Relation to Modern

Thought and knowledge.”^[7]⁵⁶ 由于他有丰富的海外经历,对“英、法、德、意、拉丁、希腊等语言文字也造诣精深”^[17]¹⁴⁷,尤其是精通拉丁语,并在授课时能得心应手地进行运用,故讲解史事时总能旁征博引、有条不紊,且“很有新意,许多内容都不是普通书本里所能看到的”^[19]⁵¹⁰。在学生的眼里,他的“学识是很渊博的”^[20],而讲课时运用“材料非常丰富”^[7]⁸⁴。齐世荣在《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外国史教授》中说他选过孔繁霁的“西洋中古史课”,听系里的一些老师说“孔先生对西洋中古史很有研究”^[21]。

四、探寻中外史学的现实效用

学习历史,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外国历史,旨在解释历史。那么,解释历史究竟有什么目的或者效用呢?古典史学家认为史学效用就是“隐恶扬善”,如罗马史学家塔西陀(P. C. Tacitu)就说:“我认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22]¹³⁷1684年法国皇室家庭教师克洛德·勒·拉戈(C. L. Legault)出版了《法国历史教育问与答》(Instruction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par demandes et Réponses),书的开头就写道:“提问:什么是历史?问答:历史是过去事情的真实记录。提问:历史有什么用呢?回答:它起到政治和道德教育的作用。”^[23]在中国,汉儒谓之“微言大义、拨乱反正”,宋儒谓之“寓褒贬、别善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提出历史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12]¹。

但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们,对“历史效用”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们不满足于原有的“资鉴”功能,希望拓宽史学的教育功能。胡适认为“历史效用”就是“实用主义”,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通过整理史料把历史学建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学科,然后运用于实践,取得“实际有用”的功效。陈衡哲认为研究历史就是“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就是要培养“读者分析现代社会上各种现象的能力”^[24]⁵,用历史这个“最有功效”的工具,去“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24]³。蒋廷黻认为阐释历史就要讲究

史学的“实用价值”,重视史学对人们的指导作用,以及史学“所能供给的知识之光”^[25]¹¹⁸。何炳松不赞同“以史为鉴”的旧说,认为“返观史地著述,犹是陈陈相因,以‘明灯’‘殷鉴’诸旧说炫世人之耳目”^[26]。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明白现状如何递嬗”^[27],使读者“了然人群特异活动之真面”^[28]²¹²。1935年他在《怎样研究史地》中重申:“我们要明白人类现在文化的真相,来做我们创造新文化的参考,得到知彼知己的功用,我以为这或是历史地理两种科学的目的和价值。”^[29]

孔繁霁更是明确表达了对“鉴戒”之说的态度^[11],他认为留在史学领域的“抱残守缺之老宿,多墨守麟经褒贬之旧义,欲以邃古之史法治二十世纪之史事;极其量不过史料之加增,万不能显史的真精神真作用”^[11]。针对梁启超的观点,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鉴戒之说,不论中外,由来久矣,然最易混人耳目,其流弊作者以目的牺牲事实。……愚诚不敢谓史不可以资鉴戒也,然以此为史之能事,则史之能事似转隘。愚以为与其谓史可以资鉴戒,勿宁为史可以使人知身处何许。”^[11]他赞赏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所讲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30]¹的观点,在课堂上反复强调“史无目的,治史专为治史。不必有为而为,有为必失真,失真则非史”^[11]。他认为学习或研究历史,必须脚踏实地地做学问,做学问旨在求真,求真在于还原历史实情,否则历史就会被虚构。他希望出国留学的学生要“学以致用”,“探取西洋史家的治史方法,于回国以后用来治中国史”^[15]¹⁵⁰。他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其“对待史学研究时的科学态度”^①,获得学生的高度赞扬,为史界同行普遍认同和接受。

结语

在现代历史学教育出现之前,中国人了解外国历史大体有两种路径,一是西方传教士带来(翻译)一些欧美史学家的著作,二是留学生(尤其是留日生)转译欧美日史学家的著作。大学兴起之后,由于我国主要高等院校纷纷开设了外国历史课程,加之清华大学提倡“中外历史兼重”

“考据与综合兼重”和“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兼重”的“三重”办学理念,大大拓宽了人们学习和了解外国历史的渠道,清华大学在这方面有着特别的贡献。对此,蒋廷黻晚年自豪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个名符其实、全国惟一无二的历史系。”^[31]¹³⁵

20世纪初期中国高等院校的外国历史教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设计出了较完善的课程体系。如清华大学在《文学院历史系课程一览表(1936—1937年)》中,“外国历史”的课程就列有“西洋通史、西洋史学史、西洋现代史、希腊史、罗马史、欧洲中世纪史、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史、欧洲海外发展史、欧洲近代初期史、西欧名著选读、日本通史、英国通史、俄国通史、近代中日外交史、中西交通史。”^[8]³³⁹

(二)使中国的史学界普遍接受了新型“史观”。当时的史学界普遍接受了新型的“史观”(如“文化/文明史观”“比较史观”“多元史观”“整体史观”等)以及多样的“治史方法”(如“内证外证法”“比较研究法”“多学科研究法”等)。以“史观”为例,鲁滨孙的《新史学》被译成中文后,何炳松本人就认为《新史学》用意深远,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砭”^[32]。谷凤池则说:“鲁先生之言,可谓最公允而得当,颇足以作吾人研究历史的新指南。”^[33]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史学系(另还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兼课)讲授“中国近代外交史”时,特别提倡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指导,指出“清华的史学课程想要培养一种新史学,使我国的史学有进一步的演化”^[34],规定“史学方法及史学哲学合为一课,为史学同学所必修”^[34]。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被张荫麟译成中文后,上海澄衷中学历史教员黄维荣在为孙寒冰主编的《社会科学大纲》写“史学篇”时

^①2009年中国科协向国务院报送《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史资料亟待抢救》,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有关领导责成中国科协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在“采集工程”2012年文件中,就采集到了1922年孔繁霁给梁启超的信中提到的史学观:“史无目的,治史专为治史,不必有为而为。有为必失真,失真则非史。”文件认为,这是老科学家对待史学研究时的科学态度。

说：“最近德国一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综括世界历史的全部，著一本书，名为西土沉沦论，以其详瞻的事实，证明他的学说……出版之后，全欧震惊，初版销到九万部之多。这不论他的学说将来是否能合于事实，但已可见历史哲学对于人生的贡献之巨大了。”^[35]¹⁸ 1937 年王栻写了《历史哲学内一部不朽的名著——〈西欧文化的衰落〉（二卷）》，指出“斯氏理论真是一种空前的理论，他根本推翻了传统历史看法，重新建立一个完全新的哲学系统”^[36]。

（三）培养出了中外闻名的史学专门人才。教育的目的是普及知识、提高心智，但关键是培养人才。以清华大学史学系为例，从 1929 年第 1 届至 1937 年第 10 届，共培养出 81 位史学专业毕业生（仅次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 1920—1937 年共培养出 298 名史学专业毕业生），其中较有名的“在美国有：何炳棣（1934 级）；在台湾有：张贵永（1929 级）、周培智（1929 级）、罗香林（1930 级）、梁嘉彬（1932 级）、杨绍震（1933 级）、陶音（1933 级）、翁同文（1937 级）；在国内有：姚微元（1931 级）、孙毓棠（1933 级）、丁则良（1933 级）、吴晗（1934 级）、夏鼐（1934 级）、黄绍湘（1937 级）”^[37]²⁷³ 等。其中张贵永、杨绍震、黄绍湘等，还专门从事外国历史的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孔繁霁作为任教清华大学史学系长达 10 年的教授，在课程建设、史观重构、人才培养等方面自有其不言而喻之功。尤其在人才培养方面，孔繁霁的治学影响了新一代史学家。黎东方说：“西洋史学方面，诱导我的是孔云卿先生”^[15]¹¹¹，他在教“西洋上古史”的时候说过，“倘若不从西洋中古史的研究入手，就学不会西洋的考证方法。然而，为了作西洋中古史的研究，不仅拉丁文必须精读，对于古法文、古德文、古盎格鲁、萨克逊文，也需要有相当深的造诣。其后张致远（贵永）去了德国，专攻十七、十八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一段；我去了法国，专攻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一段；虽则均很有功，究未能有负于孔先生的期望”^[15]¹¹⁰。1984 年黎东方在给张贵永的《史学讲话》作“序”时，又明确地说张贵永“承接了孔云卿先生的衣钵”^[38]²。李孝迁认为：“黎东方留学法国，师从

瑟博诺司习西洋史和史学研究法，便是受了孔的指示。”^[39]。李勇认为：“在孔繁霁影响下，张贵永才服膺兰克及其后学德国伯伦汉和法国瑟诺波司的。”^[39] 1931 年黎东方从法国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专任讲师（讲授“中国通史”和“历史哲学”），推荐人正是其“清华老师孔云卿先生”^[15]¹⁸⁵。所以，孔繁霁长女孔祥兰在谈到其父的学生时说：“有的已身负重任，有的著书立说，闻名全国，如……邵循正、吴晗、万家宝（曹禺）等学术界的权威人士，不在少数。”^[17]¹⁴⁸此外，何炳棣、谷霁光同样曾受教于孔繁霁^[40]。何炳棣就说他曾选过孔繁霁开设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他之所以选择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因为二年级时已课外阅读了他这巨著中最精彩的部分”^[5]⁶⁵。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内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孔繁霁因“重病在身（肺病及心脏病），不能随行”^[17]¹⁴⁸。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孔繁霁重返清华大学任教。1952 年全国进行高等院校大调整，他归并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孔繁霁从归国伊始直到退休，始终未离开过外国历史教育教学，1959 年因病在北京去逝，享年 65 岁。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齐思和在《故北京大学教授孔繁霁先生墓碑》中说：“先生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前辈，专精欧洲中古史，造诣极深，又精通欧洲古今文学……”^①。

当然，这里所讲的“外国历史”，在当时许多课程前面还冠以“西洋”“欧洲”，实属“欧洲史”或说“欧美史”与今天所讲的“世界历史”还是有差异的。但它大大拓展和深化了中国现代历史学教育的内容，表明中国的现代历史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通过传授外国历史知识，以“探取西洋史家的治史方法”^[15]¹⁵⁰，示“学生以治史之正确方向及途径”^[7]⁴⁹，既提升了中国学者的治史水平，又使中国的史学与世界史学接轨。同时，也正因为有孔繁霁这样执着于外国历史教育的学人们的共同努力，才使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外国历史教育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并为外国历史发展成为当下的“世界历史”一

^①另见 2021 年 10 月 29 日，孔繁霁教授第三子、现年 85 岁的孔祥瑞先生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笔者的碑文全文。

级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本文在修改过程中,有幸得到还健在的孔繁霁第三子孔祥琮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他提供了相关的资料和若干有益的建议,特此鸣谢!)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鲁滨孙.新史学[M].何炳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刘馨.何炳松史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4]房鑫亮.忠信笃敬——何炳松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5]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清华大学历史系.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8]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9]欧阳哲生.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1]孔繁霁.任公先生赐览病中得[J].改造,1922(8).

[1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附“补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3]王东,李孝迁.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4]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下册)[M].陈翰,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

[15]黎东方.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

[16]蒋廷黻.历史学系的概况[J].清华周刊(向导专号),1931(11/12).

[17]孔祥兰.孔繁霁历略[M]//山东滕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滕州文史资料:第5辑.1989.

[18]季羨林.清华园日记[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5.

[19]周文业,等.清华名师风采(文科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20]孔繁霁云卿[J].清华暑期周刊,1935(7).

[21]齐世荣.记20世纪40年代末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外国史教授[J].历史教学问题,2015(1).

[22]A·J·Church,W·J·Brodribbed.The Complete Works of Tacitus[M].New York:Modern Library,1942.

[23]索维尼.历史教科书的转变[J].历史信息(Information Historique),1977(5).

[24]陈衡哲.西洋史[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9.

[25]蒋廷黻.蒋廷黻选集:第一册[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26]何炳松.史地丛刊发刊词[J].史地丛刊,1920(1).

[27]何炳松.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义[J].史地学报,1922(2).

[28]何炳松.历史研究法[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29]何炳松.怎样研究史地[J].文化建设(月刊),1935(8).

[30]王国维.王国维讲国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

[31]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32]史学界新闻:新史学译本出版[J].史地学报,1922(2).

[33]谷凤池.历史研究法的管见[J].史地丛刊,1922(3).

[34]蒋廷黻.历史学系[N].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2-03-09(397).

[35]孙寒冰.社会科学大纲[M].上海:黎明书局,1929.

[36]王棫.历史哲学内一部不朽的名著——《西欧文化的衰落》(二卷)[J].书人月刊,1937(3).

[37]苏云峰.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0.

[38]张贵永.史学讲话[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

[39]李孝迁.《史学原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J].史学集刊,2007(3).

[40]李勇.张贵永与西方史学研究[J].史学月刊,2014(1).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History Subject in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Focusing on the 10 Years when Kong Fanyu Taught in Tsinghua University

ZHANG 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Historiography is traditional learning in China, but there is no education about foreign history knowledge in the old-styled historiography education. With the ris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foreign history education comes into being. Mr. Kong Fanyu taugh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from 1927 to 1937, and was a pioneer for establish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he early world history education in China. The historians with new ideas, represented by Mr. Kong Fanyu, drew the historical ideas of Europe and America into China, introduced diverse historical methods, set up a general course of historiography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and fully showed the different practical effects produced by the different idea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ography in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tting up these courses broadens the vi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ccumulates the experience of studying foreign history, and a more perfect course system is designed, which makes the Chinese historical circles generally accept the new-styled “historiography concept”, and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inal development of foreign history into the current first-level subject: “World History”.

Key words: Kong Fanyu; world history subject; historiography curriculum; historiography concept; historiography method

(责任编辑 雪 箫)